

XUNZHAO YIZHE WENHUA SHENFEN
YI LINYUTANG HE
GUHONGMING WEI LI

寻找译者文化身份

——以林语堂和辜鸿铭为例

刘彦仕

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XUNZHAO YIZHE WENHUA SHENFEN

YI LINYUTANG HE

GUHONGMING WEI LI

寻找译者文化身份

——以林语堂和辜鸿铭为例

刘彦仕

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出版
四川文理学院面上项目基金资助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译者文化身份——以林语堂和辜鸿铭为例/刘彦仕著.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504-1517-1

I. ①寻… II. ①刘… III. ①英语—翻译—研究②林语堂
(1895~1976)—人物研究③辜鸿铭(1856~1928)—人物研究
IV. ①H315.9②K825.6③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5993 号

寻找译者文化身份——以林语堂和辜鸿铭为例

刘彦仕 著

责任编辑:林 伶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封俊川

出版发行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 55 号)
网 址	http://www.bookcj.com
电子邮件	bookcj@foxmail.com
邮政编码	610074
电 话	028-87353785 87352368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mm×210mm
印 张	7.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4-1517-1
定 价	38.00 元

1.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2.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可向本社营销部调换。

目 录

第一部分 绪论 / 1

1.1 翻译与文化 / 2

1.2 翻译研究中的译者问题 / 4

1.3 文化身份观 / 7

1.4 翻译与文化身份 / 10

1.5 译者主体性 / 12

1.6 译者的文化身份问题与翻译策略 / 15

1.7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方法与意义 / 21

1.7.1 理论基础 / 21

1.7.2 研究方法 / 21

1.7.3 研究意义 / 22

第二部分 基于翻译文本的个案分析 / 26

2.1 译者文化身份的建构 / 26

- 2.1.1 译者文化身份 / 26
- 2.1.2 译者与建构译者文化身份 / 27
- 2.1.3 意识形态与建构译者文化身份 / 30
- 2.1.4 权力话语与建构译者文化身份 / 33
- 2.1.5 译者文化身份构建对权力的作用 / 37
- 2.2 林语堂的译者文化身份 / 38
 - 2.2.1 译者文化身份的杂糅性：以林语堂为个案 / 40
 - 2.2.2 从英译《浮生六记》解读林语堂的译者文化身份 / 51
 - 2.2.3 翻译伦理模式视角下的译者文化身份 / 61
 - 2.2.4 林语堂与英译《老残游记》 / 74
 - 2.2.5 布迪厄社会学视角下林语堂的译者翻译行为 / 86
- 2.3 辜鸿铭的译者文化身份 / 96
 - 2.3.1 后殖民语境下辜鸿铭的译者文化身份及其翻译行为 / 97
 - 2.3.2 辜鸿铭译者文化身份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 107
 - 2.3.3 动态顺应：辜鸿铭英译《论语》 / 118
 - 2.3.4 辜鸿铭与英译《中庸》 / 132
 - 2.3.5 社会学视角下辜鸿铭典籍英译作品的跨文化传播 / 142

第三部分 林语堂与辜鸿铭的译者文化身份

比较 / 156

3.1 共相 / 156

3.1.1 译者的个人文化身份：杂糅与建构 / 156

3.1.2 译者的社会文化身份：流散与重构 / 161

3.2 差异 / 165

3.2.1 身份认同与译语风格 / 165

3.2.2 社会认同与翻译赞助 / 176

3.3 译者身份痕迹对比 / 182

第四部分 结语 / 198

附录 / 203

参考文献 / 207

后记 / 226

第一部分 绪 论

翻译实践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翻译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却不久远。翻译实践和经验性的译论曾经“一统天下”，东西方皆然。擅长于分析的西方翻译学者体系化地发展出了各派翻译理论，而我国的翻译研究仍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未能建立其中国特色的翻译构建体系。曾几何时，躬身实践的翻译家对长于逻辑思维且喜欢“空对空”的理论家嗤之以鼻；搭建体系的翻译理论家对长于形象思维但不善于升华的实践家“指点江山”。

从本质上讲，翻译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犹如一座桥梁，把两种相异的文化连接起来，在跨文化交流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双语转换的交流过程中，译者无疑是最活跃的因素，因为翻译是一种涉及作者、译者、读者的工作，对于作者和译文读者来说，译者是中介，他既是两者沟通的媒介，又是保证交流顺利进行的关键。

翻译与翻译研究的历史，归根结底是译者“怎么译”和译评者“怎么评”的历史。为什么要以译者为切入点对其行为进行研究？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是意志体，译文中必然融入了太多译者意志性的东西。

众所周知，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专指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专业读者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因而会更多关注语言本身；而大众读者则出于阅读欣赏之需要，更关心语言的表达是否自然

明晰。也可以说,前者对于形式的关注甚于后者,而后者对于内容的强调则明显甚于前者。事实上,对于大众读者而言,判断一个译本是否优秀,就是看它是否与目的语文化传统以及读者自身的审美意识相一致。换言之,就是看源语与译语在文化功能上是否实现了对等移植。毕竟,读者都是带着文化先结构的“有色眼镜”去理解和接受外来文化的。如果翻译文本所折射出的文化基因与目的语所代表的文化身份相冲突,那么翻译文本就很难在异域文化中站稳脚跟。当然,如果二者可以和谐共存的话,翻译文本就可以在目的语文化中大行其道,甚至完成翻译文本的经典建构历程。

1.1 翻译与文化

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的话,那么作为语言转换手段的翻译就与文化永远也脱不了干系。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奈达博士更是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语言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下才有意义。”(For truly successful translating, biculturalism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bilingualism, since words only have meanings in terms of the cultures in which they function.)^①当然,他这里所谓的“翻译”实际上是针对一切翻译的门类而言的,包括文学的和非文学的各种类型。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于目的语文化背景的考察怎么细致都不过分,除非他不希望自己的译本得到认可与接受。当然,所有翻译行为所介入的环节都必须以语言作为前提

^① Nida, Eugene A.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82.

和条件。理论上讲,语言不仅具有认知与表达功能,还有储存文化信息和传播文化传统的社会功能。因此,当用文字表达一种思想或叙述某个事物时,它便不再是单纯的语言传播,而是文化的传播与流布。语际翻译当然就更是如此了。翻译的过程因此变成了由单纯的文字转换成为借助文字来阐释其文化意义的过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翻译文本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在此过程中得以实现。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源语的文化价值观以及文化习俗在经过适度改造(为的是不与东道国的文化传统相悖,从而引发抵制和排斥)之后,就可以比较顺利地为目的语文化中立足。翻译也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过程。因此,对于译者在翻译中的角色,王佐良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他(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①因此,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可以说,了解目的语文化传统乃是一切翻译活动和文化交流得以成功的重要基石。

翻译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表现在翻译活动的目的性以及翻译选材的倾向性上。翻译什么样的作品?如何翻译?往往视目的语文化语境不同而有所不同。事实上,它不仅受翻译场域的制约,也受译者自身文化身份的影响。换言之,我们无法期待清末的翻译家林纾用白话和异化的翻译策略来进行翻译,因为他所置身的翻译场域不允许他这样做。其目的语文化需要的是一个经过改造的、满口之乎者也、留着长辫子的西洋卫道士的形象。如若不然,定会招致当时知识界甚至是全社会人士的口诛笔伐。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正是林纾迎合国人欣赏好尚的“豪杰译法”,为他的诸多译作赢得了巨大的文学名声;而这些翻译作品在当时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以及非同寻常的文化

① 王佐良. 翻译思考与试笔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启蒙作用,是我们后来者所无法想象的。当然,我们认为选材的倾向性通常也依赖于目的语文化建构的需要。例如在文化转型期,翻译活动之所以出现高潮,就是目的语文化语境出于从翻译中吸取营养、建构新文化的实际需要。美国战后之所以出现了一次翻译东方、翻译中国的热潮,就是美国的知识界希望借古老的东方文明的清新之风来荡涤美国文化中的陈腐之气所致。显而易见,翻译总是在各个层面与文化相关联。因此,良性的翻译活动与文化交流就必须走出本土文化的封闭圈,敞开胸襟,以一种包容的姿态去理解和接受异国文化。其实,这样的世界胸怀无疑将推动本土的文化建设。

就翻译的社会性而言,翻译活动就是一种具有一定目的性和倾向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总是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功能。因此,译者对于翻译题材的选择以及翻译内容的取舍都不可能是盲目的。甚至,从某种角度来看,目的语的文化需求就是翻译的目的,而翻译目的决定了译者的选材标准和最终的翻译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翻译行为的实施者——译者而言,如果对翻译对象有较好的文化意义上的了解的话,其翻译作品就容易得以流布和接受。反之,则会显得生硬呆板,甚至晦涩难懂,最终被读者弃置一旁。

1.2 翻译研究中的译者问题

什么是“译者”?查阅《现代汉语词典》,有“译员”(翻译人员(多指口译的)),无“译者”。再查阅1997年版林煌天的《中国翻译词典》,也未见对“译者”的定义。我们只在孙艺风等编译的《翻译研究关键词》中看到,将“Translator”译为“译者/译员/翻译家/笔译人员”是“将源语文本的意义用

目的语进行传达的交际专家”。^①任何一种翻译活动都离不开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译者，都离不开译者对原作者所认识的事物的再认识和再表达。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译者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维、文化立场和价值观的个体，其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会在选择源语文本、制定翻译策略、处理翻译文本、解决翻译困难以及追求翻译目的的整个过程中得到体现。译者作为个体在某些时候对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而译者作为群体在译介源语文化和丰富目的语文化，从而推进人类文化的整体历史进程上发挥重要作用。

从整个翻译发展史看，过于强调译文对原文的忠实，遮蔽了译者。伴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翻译界兴起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对译者的研究才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预示着翻译的文化功能将成为译论研究的重点。然而，翻译的文化功能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意图和文本在目的语中的功能转换。因此，翻译研究中对译者的作用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只是停留在一般的呼吁“正名”阶段，而应当做的是，确立译者在翻译活动的“中心”地位。

传统翻译理论在二元对立认识哲学的影响下注重作者和原文，一味主张以原作为权威，一味追求译作与原作全方位的契合，把“忠实”看作翻译的最高标准。译者唯有紧跟原作，唯作者是从，在翻译过程中束手束脚，以免留下痕迹遭人责骂。在此种情况下，译者的主体性受到压抑，其地位被边缘化，成为沉默的“他者”。译者的形象也被比作诸如“舌人”、“仆人”、“奴隶”、“媒婆”、“翻译机器”、“美而不忠的女人”等。

① 迪里索，利加恩克，科米尔. 翻译研究关键词 [M]. 孙艺风，仲伟合，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这些比喻指出了翻译的特点和困难，也暗含了对译者的价值判断。^①古今中外对译者还有很多精彩的比喻，如哲罗姆的“征服者”、德莱顿的“画家”、鲁迅的“Prometheus”等。还有不少译论家将译者比喻为“桥梁”、“摆渡人”、“协调者”、“钢琴演奏家”、“雕塑家”、“演员”、“摄影师”、“叛逆者”、“隐形人”、“杂家”、“学舌鹦鹉”、“传声筒”、“应声虫”等。虽然褒贬不一，但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译界对译者的身份和作用问题的关心和关注。^②

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两种语言之外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都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的结果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译者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译者在翻译文本中是不可能隐形的，有时甚至会主动站出来与目的语读者进行交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兼有双重身份——（源语文本的）读者身份和（目的语文本的）作者身份。但是，译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他承担着对原作进行传达的责任和义务。他不仅要读懂原文，更要读透文字背后的蕴意，因此当译者的难度远远大于当一般的读者。一部好的作品，不仅是这种再认识和再表达的结晶，更是译者独具特色的身份证明^③。

翻译不可能与原作相等，因为原作通过翻译已经起了变化；况且，没有蜕变，“后起的生命”也不可能产生。^④所以，译者不仅是原作的读者，更是原作生命的延续形式——译本的作者。可以说，译者的劳动甚至高于原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原作者按

① 查明建，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 [J]. 中国翻译，2003（1）：20.

②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 [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47.

③ 田德蓓. 论译者的身份 [J]. 中国翻译，2000（6）：20.

④ 陈德鸿，张南峰.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 [M]. 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197.

照自己的喜好选材，并且完全按照自己的写作风格进行创作，只拥有自己的世界观。而译者却要面对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世界观和不同的风格。于是译者必须是不同文化的中间人，译者要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结合于一身。翻译时，他不仅要考虑篇章词句和狭义的上下文的联系以及原作的文化精髓，而且还要考虑时代、民族、阶级文化背景和读者的需求，考虑作品的思想、风格和具体的历史环境，考察作者的世界观、创作意图、艺术手法和总的艺术风格，以及译文所能产生的艺术效果和社会作用等。

在后现代语境下，“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作为原作的读者群体里的一员，译者主体在“作者死亡”的前提下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尤其是女性主义翻译和后殖民主义翻译中译者主体性获得了极度张扬。对此有必要对译者主体性问题作出新的阐释以使翻译主体性的理论认识趋向积极的发展轨迹。

1.3 文化身份观

学术界对文化身份研究的兴起的时间和有关的探讨目前尚无定论。在《文化身份和全球化进程》一书中，乔纳森·弗雷德曼从文化政治的角度将对文化身份的关注定格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从 1970 年代中期起（在美国还要更早）兴起的文化政治从建立在普遍进步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全面转向……转向与性别、地方或种族身份相关的文化身份政治。这

变现为‘新’身份，新社会类别以及通常情况下新政治群体的增生。”^①文化身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形成的集体文化意识使集体文化身份与他者文化区分开来。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交织着的文化身份政治遵循着拉康（J. Lacan）的文化心理学的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和互动原则，葛兰西（A. Gramsci）和威廉姆斯（R. Williams）的压制与反抗的霸权理论，后殖民文化批评的中心与边缘的对立、颠覆和对话原则。安东尼·吉登斯（A. Giddens）就认为身份是一种思维模式，是一项身份工程^②。

所谓文化身份，是指“人们对世界的主体性经验与构成这种主体性的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的联系”^③。简言之，是一个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在于他人、他群体、他民族相比较下所认识到的自我形象。宏观层面的文化身份包括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微观层面的文化身份则是某一个体或群体根据不同的地域、职业、性别、年龄和阶级等形成的。按照社会学家张裕禾^④的观点，文化身份的构成成分之中最为重要的是以下五点：

（1）价值观念或价值体系，包括宗教信仰、伦理原则、世界观和人生观、集体和个人的社会理想。这是文化身份的核心部分。

（2）语言。包括书面语、口语、方言、行话以及表达语言的符号——文字。在身份体系里，语言扮演联络员的角色，其

① Friedman, Jonathan. *Cultural Identity and Global Process*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234.

② 陶家俊. 文化身份的嬗变——E. M. 福斯特小说和思想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78.

③ Gilroy, P. *Diaspora and the detours of identity* [M] // In K. Woodward.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322-346.

④ 张裕禾, 钱林森. 关于文化身份的对话 [M] // 乐黛云, 李必雄. 跨文化对话 9.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2: 72-73.

他部分都通过语言起作用。

(3) 家庭体制。包括家庭形式、婚姻关系和家庭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家庭就像个文化身份的三棱镜,凡是文化上具有特征的一切,在家庭生活中都会得到反映。

(4) 生活方式。主要指衣食住行,即穿着方式、饮食习惯、居住方式和交通方式。

(5) 精神世界。指的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集体记忆里所储存的各种形象。

个人文化身份会对其行为造成影响。查尔斯·泰勒在讨论“身份危机”时指出,身份问题与意义和价值相关,因此,在“身份”与“取向”之间存在基本的联系。换言之,知道自己是谁也就是在道德的空间里做出自己的取向选择:正是在该空间中,诸如好与坏、值得做与否、什么对你是有意义的和重要的、什么是微不足道的或第二位的等问题出现了^①。

人类的认知遵循着自我与他者互为主客逐步接近这一模式。每一个体都会选择一种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归属加以认同,绝大多数情况下母语文化即是这一选择,其他文化则被视为他者。文化身份的形成就是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对比审视中完成的。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②。也就是说,文化身份是一种社会建构,因此经历着不断的变化。文化身份的建构依赖于某种“他者”。自我正是通过与“他者”的比较、互动与协商而得以定义。强势、

① Taylor, Charles.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8.

② 爱德华·萨义德. 东方学 [M]. 王宇根,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427.

主流的文化将弱势的、边缘的文化他者化，以便为自己的身份定位，并获得一种“位置的优越”^①。正如乔治·拉伦所言，“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② 因此，对文化身份的特性有三点共识：文化身份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转移而变化的；文化身份的成分与成分之间是互动的，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文化身份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是个常变常新的延续体。

1.4 翻译与文化身份

翻译作为“文化超越过程”，是在目的语文化和社会中形成的异域文化身份。可见，翻译对异域文化身份有着巨大的建构力量，而这种建构背后隐藏的却是本土的政治和文化关怀。特贾斯维妮·尼南贾纳在其《为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和殖民语境》一书中详细解析了18世纪、19世纪初的英国殖民译者是如何通过翻译印度文献来塑造印度人品行卑劣、愚昧无知、逆来顺受的形象的，从而既突显了“‘高等’欧洲文明的高尚风貌”^③，又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扩张提供了貌似崇高的借口。斯皮瓦克在其著作《教学机器之外》里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翻译是一处简单的模拟表演，将对他者在自我之中的痕迹的感应

① 爱德华·萨义德. 东方学 [M]. 王宇根,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10.

② 乔治·拉伦. 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 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 [M]. 戴从容, 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194.

③ Niranjana, Tejeswini. 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22.

活演出来”^①。劳伦斯·韦努蒂在研究美国对现代日本小说的翻译后发现，随着美日两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共戴天的仇敌转变成为冷战期间不可或缺的盟友，日本小说的英译典律着意将日本塑造为一个被审美化了的完美国度，与其以往穷兵黩武的形象截然相反，这明显是为了对美日外交关系从本土给予文化上的支持^②。

翻译对本土文化身份也起着重要的建构作用。正如韦努蒂指出，翻译“不可避免地被用来支持雄心勃勃的文化建设，特别是本土语言与文化的发展。而这些项目总是导致了与特定社会集团、阶级与民族相一致的文化身份的塑造”^③。学者张景华（2004）从后殖民理论角度解析了翻译的政治、典律和伦理，以及它们与构建民族文化身份的关系，并指出弱势文化的译者应避免自我殖民，应该借助于翻译对本民族的文化身份进行重新书写。

关注译者文化身份的定位，以及译者的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谢莉·西蒙（S. Simon）和路易斯·冯·费洛图（L. von Flotow）在她们的著作中都提到了女性主义译者为忠实于自己的性别身份政治而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对原作进行种种形式的操控。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中应尽量以女性意识驾驭文本，以便“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人”^④。学者杨仕章分析了译者的主流身份（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和

① Spivak, G. C.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179.

② 韦努蒂. 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 [M] // 许宝强, 袁伟.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365-366.

③ 韦努蒂. 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 [M] // 许宝强, 袁伟.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372.

④ Simon, Sherry.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20.